

Where 东方主战场

Who 抗战中的企业家

血沃淞沪 红色基因渗透园区金融

■ 本报记者 王莹

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——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。这里，将举办《“血沃淞沪”——八一三淞沪会战主题展》，再现当年惨烈战况。

当我们再来到这里，当年“血沃淞沪”的硝烟早已散尽。清晨的公园，高大的树木阴翳下，让人有一种被守护的感觉。早起的老人三三两两在此结伴散步，置身其中，闭上眼睛，能充分体会到此地的安宁与祥和。广场中“淞沪军民抵抗日军侵略”的大型群雕，写着“牢记历史、不忘过去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”的警世钟，不仅无言诉说着当年的这里曾作为主战场所遭受的创伤，也引导着人们，在自然放松的心境下，将今日和平与78年前的那场鏖战联系在一起。

一息尚存，奋斗到底

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，中日两国精锐部队在狭小的淞沪战场上展开殊死搏斗。主战场是纵横几百千米的三角地带，三角形的北边是长江，南边是钱江和杭州湾，西边则是太湖，再向西几百千米就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。这一战场位于交通要冲，且易攻难守。

“8月13日下午4点开始，就投入了战斗。第一仗就是打八字桥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。”据88师262旅523团的抗战老兵潘世华回忆，日军从水陆不断炮击我军阵地，上海到处都是大火。“大家都是热血青年，打仗时大家都很英勇，不怕死。我们进去有100多人，由于之前没有侦查好，日军开着坦克车、战车堵住桥头，两边的进出口都被堵死了，进退两难。”“日军火力非常猛，攻过去后，牺牲了一排人，连长曹英带领的4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。”

经过10天攻坚战，攻击敌军核心据点指日可待时，战况风云突变。日军增援部队6万人开始实施迂回包围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。淞沪会战进入抗日登陆作战阶段。

“在梦里，我回到过上海，回到过四行仓库。子弹在身边飞，仓库厚厚的墙壁掩护我和战友们。我们冲啊，冲啊。”曾经的“八百壮士”老兵杨养正说：“我们其实只有400多人，为了迷惑敌人佯称800人。”从10月26日起，423位战士在88师524团团长沙晋元带领下，抱着必死的决心，背水一战。

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，易守难攻，与南岸公共租界仅隔一座西藏路桥。在四五天

夜的战斗中，苏州河南岸上万人观战。“谢团长不断巡视，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把仓库攻下来！战友们个个都说，死也不愿做亡国奴。”杨养正说。

战斗在10月27日打响。午后1时，已经占据几乎整个上海的日军，开始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。

四行仓库硝烟弥漫，租界中老百姓揪心观战。见敌军偷袭，对岸百姓便大声喊叫，还用大黑板写字、画图，报告我军防备。上海各界发起了捐赠，大量的食物、水果、衣物、器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被送入仓库。

战斗间隙，谢晋元组织“八百壮士”在仓库里共写下298封遗书，给妻儿、给父母，字字血泪，句句含情。谢晋元写道：“晋元决心殉国，誓不轻易撤退，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……”

日军久攻不下，损失惨重，向租界施压。租界为自保，要求中国军队撤兵。10月30日夜，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。次日，八百壮士挥泪退出租界，日军放火烧了四行仓库。至此，上海全部沦陷。

进入发展新时代

历史的车轴，碾过了78年。炮火声虽然早已远离，那些血与火的洗礼，生与死的较量，却一直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，历史不能忘却，未来自强不息。

在这片被先烈染红的大地上，创新的激情正燃情绽放。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代表的新经济、新业态，在这里呈全面发展的蓬勃之势，园区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。2010年，康桥工业园、国际医学园区划入张江；2012年，周浦繁荣工业园划入张江。目前，张江高科技园区地域面积约79.9平方公里，下辖张江核心区、康桥工业区、国际医学园区、周浦繁荣工业园。

2014年12月29日，国务院决定上海市自贸区扩区至张江片区，面积37.2平方公里，东至外环线、申江路，南至外环线，西至罗山路，北至龙东大道，为张江园区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。

目前，张江园区注册企业1万余家，初步形成了以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文化创意、节能环保等为重点的主导产业，第三产业占2/3以上。

“科技DNA”的金融创新

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国家级的重点高新

技术开发区，许多改革的新思路、新举措，在这里得以“先行先试”。

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获悉，国内缺乏聚焦科技创新金融服务银行的历史，极有可能在上海张江科技园区被打破。张江科技银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，目前已进入发起人遴选阶段。

这家带有鲜明“科技DNA”的银行，将进入一系列普通商业银行不愿、不敢、不想进入的业务领域，或许会推出“成果中试贷”“仪器租赁贷”等极具科技特色的金融产品。

事实上，张江科技银行的方案设计去年就已启动，筹备工作目前由张江高新区管委会牵头，联合上海市金融办和市银监局等部门共同推进。

由于知识经济具有更新快、轻资产等特点，相应地带来了无抵押、无担保、小额度、短周期等融资需求，特别是在研发设计、信息服务、文化创意等产业领域和产业园区，此类需求更加明显。然而，由于传统银行对高科技行业了解不多，在缺乏抵押物的情况下，要清晰判断创新成果的商业前景，准确把握中小科技企业的信贷风险，难度极大。

此外，随着科技园区逐渐从主要依靠大企业、大项目的传统模式，转向以创新团队、中小企业甚至创客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新模式，金融服务也面临深刻转型。

以张江高新区为例，2012年，该园区从8家银行获得1900亿元信贷额度，但实际放贷额度仅500亿元，基本用于大企业、大额度、长周期的生产和基建融资。

据了解，张江科技银行将按中资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要求设立，注册资本规模预计为30亿元到50亿元。它将围绕技术研发、成果中试、企业孵化、科技服务等4个主要环节布局金融产品，主要服务科技型企业、创新创业人才、科技园区这三大对象。

目前，张江在全市大部分的分园中，都建立了金融、信用、知识产权、人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，透过这张覆盖方方面面的公共服务网络，已经可以初步提炼出园区内7万家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运营状况、创新能力、信用水平、知识产权价值等关键信息。

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经过数轮专家论证后，张江科技银行的总体方案已经确定。园区内企业对它十分期待，组建张江科技银行在制度和制度层面不存在障碍，事实上，它也不需要特殊的政策环境和监管标准。根据计划，它将在今年三季度完成发起人遴选。

荣氏兄弟：身先示范 实业抗日

■ 晋珀 郭健 薛怡然

太平天国时，无锡遭战乱，荣氏一门几乎灭绝，荣毅仁的爷爷荣熙泰在上海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幸免于难。后来，他成家立业，先后生下荣宗敬、荣德生两个儿子。荣宗敬、荣德生两兄弟十多岁就开始谋生计，头脑灵活、手脚勤快。1896年兄弟俩与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广生钱庄。钱庄开业的当年夏季，荣熙泰先生因病辞世，临终给儿子留下“固守稳健，谨慎行事，决不投机”的从业遗训。

荣氏家族崛起

秉承着父亲的遗训，兄弟二人精心经营，钱庄获得厚利，并开始在上海与人合办保兴面粉厂，1903年独资经营更名为茂新面粉厂，从此奠定了荣氏家族工商业的基础。

此后，日俄战争爆发，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倒闭，面粉价格上升。荣氏兄弟抓住商机，扩大规模，先后开办了包括福新面粉厂等12家分厂，面粉厂生意如日中天。1915年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了申新纺织厂，到1932年共开办了9个分厂，年产量占中国棉纺织总量的18%，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工厂。在实业有成的同时，荣氏兄弟还致力于家乡教育、公益事业，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、竞化女子小学、公益工商中学(后改为公益中学)、大图书馆，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。

实业救国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不断有日商在中国商业繁华之地开办工厂，无锡也包括在内，其最终目的是断绝后方对前线抗战的经济支援。当时荣氏兄弟已成为无锡名震工商业界的“面粉大王”和“棉纱大王”。日商开始找荣氏兄弟寻求“合作”，想把荣氏企业据为己有，但第一次谈话便被两兄弟严词拒绝。

两兄弟虽然做事风格和行事方法截然不同，哥哥荣宗敬雷厉风行，手段霹雳，弟弟荣德生慎思笃行，稳健保守，但在这件事的认识上高度一致。

接着，荣氏兄弟开始与日商在生意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两兄弟还劝说其他商业界人士一起对抗日商，呼吁群众不要去日商企业和工厂务工，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前线的战斗，不断地捐赠物资和金钱。随着斗争愈演愈烈，日商开始威胁、绑架甚至用武力来对付荣氏兄弟及工厂。后来荣氏兄弟不得不决定将南方企业纷纷西迁。无锡郊外的申新三厂先行实施迁厂。当装着第一批船机的船队行至镇江，镇守海关的国民党军强行征收关税，将船队挡在关外。一个月后第二批船队抵达，再次遇阻，直至无锡沦陷，船队仍未驶出镇江，最终除3000担棉花转运上海租界，申新三厂的资产被日军洗劫一空。

随着抗战的不断推进，淞沪战事爆发，上海火车站附近的新新堆(荣氏工厂的开办地)被日军炮火击中，荣氏工厂存在的面粉、小麦全被焚毁。在抗日战争中，荣氏企业约1/3的纱锭、一半以上的布机及2/5的粉磨机器被破坏，幸存下来的大都被日军“军管”掠夺。

荣氏兄弟一时陷入了事业的低谷，也成为民族工业遭重创的一个最显著的案例。哥哥荣宗敬忧郁成疾，他带着悲愤离开上海到达香港。1938年2月10日，荣宗敬在忧心中辞世。临终，他告诫子侄后辈：“咱们办厂不易，工厂千万不要留给日本人。”

民族精神传承

哥哥去世之后，荣德生独自担起被日军摧毁而破败的荣氏产业。

这时日商觊觎荣氏纱厂，并委托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自来沪与荣德生面谈，要他将申新一、八厂“卖”与日本丰田纱厂，荣德生严词拒绝。

1949年，上海商业界人士纷纷离开内地迁往海外，然而荣德生坚决留下来并对众人说：“生平并未为非作恶，焉用匆匆逃离？”这时，荣家第三代荣毅仁也已独当一面。

荣毅仁生于1916年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历史系，抗战期间，曾担任茂新面粉厂助理经理，当时他提出了在全国建几十个面粉厂的“托拉斯计划”。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率先提出将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，无偿交给国家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1979年6月，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。在他的精心经营下，中信公司涵盖了金融、租赁、对外贸易、房地产、航空等多个业务领域，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，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。

荣智健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，1987年出任中信(香港集团)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。1998年被委任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八届、九届连任。

荣智鑫，香港荣文科技董事及创始人、香港浩荣集团创始人及董事、香港梅尔雅国际健康机构主要创办人、方正数码集团的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。

荣明杰毕业于美国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政治系，现为中信泰富公司执行董事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)

When 八年抗战: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八

“战时税制”使群众叫苦不迭

1937 抗战爆发后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相继被日寇占领，大批工矿企业落入敌手，一些工矿企业也被迫西迁。

1938 日本的人侵对财政经济造成巨大破坏，使得占全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以及占全税收入20%以上的统税都大幅减收。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青岛、汉口等海关接连沦陷，沿海盐场如长芦、山东、淮北、苏北、两浙、广东主要产盐区的相继失陷，使政府财政收入锐减，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。

1940 → 1943 → 1945

原来的财源已经无法适应战时财政的需要。1938年3月，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通过了由孔祥熙、宋子文亲自参与制订的《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》，提出要“推行战时税制，彻底改革财务行政”，措施是用“新三税取代旧三税”。

“新三税”里增加的主要是直接税。孔祥熙还明确规定：从1937年10月1日起，凡在海关所在口岸运输的土货，除已征统税及烟酒税者外，经海关及分卡时，均予征收从量货物转口税5%，从价征收7.5%。

差不多从1939年开始，国民政府还在经济贸易方面进一步整顿日税，以维持原有的税收，适应战争对经济和战略物资的需求。

1942年5月，国民政府颁布了《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》规定：对国家急需的物资如钢铁、机器等减免税收鼓励进口，对非必需品如烟土等禁止进口；而与军事有关的粮食、五金禁止出口，对并不急需同时又可以换取外汇的土特产品如生丝、茶叶则免税出口。

这一系列财税经济措施的施行，逐渐弥补了因沿海城市及海关沦陷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的损失，但是，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。

“推行战时税制”，导致后来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到抗战后三年里，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，乱开税种，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。

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要图



1937年8月21日，一辆中国战车直冲日军阵地。